

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附逆

黄开发

论文摘要：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和沦陷时期的周作人思想中，有一条和平观念的线索。战前，周作人认为中国抗战是必败的，因此主和；北平沦陷后，他出于某种抵抗政治和个人保存的双重考虑，走上一条投降主义的“和平”道路，开始下水附敌；及至出任伪教育督办，一方面虚与委蛇地与日伪合作，一方面，关注教育民生，提倡经过他自己重构的儒家思想，进行文化政治抵抗。几个阶段始终都贯穿着他对抗战命运的失败主义的认识，思考的焦点是如何在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最大程度地保存民族实力和自我的问题。周氏在附逆期间所作所为的背后有着相对稳定的和平观念和原则，他在附逆期间的诸多看似矛盾的选择可以在这一思想原则下得到较为合理的阐释。周作人对抗战形势和前景的误判使他误入歧途，陷入人生的困境，给本民族造成很大的危害。他的和平观念带有历史的污点，然而在沦陷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不乏思想史的价值。

关键词：周作人 和平观念 附逆

1951 年，北京大学师生废名和乐黛云等到江西吉安专区参加土改工作。许多年后，乐黛云回忆了她与老师废名之间的一次对话——

他又问我对周作人怎么看，我回说他是大汉奸，为保全自己替日本鬼子服务。废名说我又大错特错了，凡事都不能抽空了看。不能只看躯壳。他认

为周作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有智慧的人，他宁可担百世骂名而争取一份和日本人协调的机会，保护了北京市许多文物。废名先生说，义愤填膺的战争容易，宽容并做出牺牲的和平却难。事实上，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并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废名先生关于已知和未知的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对待广大未知领域的原则，他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我却始终是半信半疑。如今，恐怖与反恐怖之战遍及全球，我又不能不常想起先生“和平比战争更难”的论断。¹

废名是周作人著名的弟子。1930年代中期，他甚至把周作人与孔子相比，认为知堂是儒家，在他的文章里，“随处感得知者之言，仁者之声”，从中可见他的心情，然而这是难以企及的。”²抗战结束后，周作人沦为阶下囚，而废名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十一章《一天的事情》中，借人物的口吻对周氏大加赞美。他为周作人滞留北平、出任伪职辩护，称其“注重事功”，“忠于道理”，“只求有益于国家民族”；甚至说，“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愤恨，他愤恨别人不爱国，不过外面饰之以理智的冷静罢了。”³尽管世事沧桑，但学生对老师的高度信任和崇敬之情一如既往。他的态度着实令人称奇。尊崇一个人自然容易看到他身上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也容易放大一些东西，甚至以他的是非为是非，以他的话语为真实。

废名的话使我意识到周作人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和沦陷时期的思想中，是有一条和平观念的线索的。然而，这条线索迄今不为人关注。究其原因，一是他的和平观念不像其“人的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妇女论与儿童论等理论主张那样，可以找出显豁的外在标志，它更多地潜存于波诡的水面之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相关研究受到了一些观念的束缚，一顶“汉奸”的帽子往往遮蔽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谈到“汉奸”一词对研究的

1 乐黛云：《永恒的真实——难忘废名先生》，《师道师说·乐黛云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1月，79页。

2 废名：《关于派别》，1935年4月20日《人间世》26期。

3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续），1948年4月《文学杂志》2卷11期。

影响时说：“在无辜者与混蛋之间没有留下中间类型，没有留下不确定的空间，没有留下理由来回忆和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还说：“当一提到‘合作’时，立即就会给研究者冒着风险描述的政治现象施加了人为的道德框框，因此就会导致仅从道德角度来解释合作政治，阻止了从其他方面进行考察。历史研究者必须设问，合作者预先假设的道德准则是如何形成的，而不能根据这个道德准则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我们既不能接受在历史真实面前添油加醋，也不能对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我们的任务是透过这些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框，审视其背后的政治事实，来了解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⁴我并不认同作者书中所体现的非道德化倾向，但他所指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明显存在的。具有浓厚政治、道德色彩的标签容易导致对历史人物的类型化认知和漫画式处理，忽视、误解甚至曲解其真实性和复杂性。与其进行简单化的道德审判，不如暂且把那些道德观念悬置起来，深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去，考察制约人物选择的动机、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及其行为准则。俗话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而实际上，乌鸦是有不同的颜色的。基因变异而产生的白乌鸦自可不提，达乌里寒鸦的颈部、胸部和腹部是白色的，白颈鸦也有着白色的颈部和胸部。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时局变化、他的个人选择之间的互动，寻绎其思想观念的内在联系，试图找出一个可以阐释他在附逆期间思想和行为的整体框架，从而加深对其附逆事伪问题的认识。为此，我把周作人和平观念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北平沦陷。日本军队步步进逼，周作人认为中国如果抗战是必败的，因此坚持主和；第二个阶段是他从北平沦陷后留北到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他出于某种抵抗政治和个人保存的双重考虑，逐渐下水事伪；第三个阶段是其出任督办以后的事伪期间。他持有一种失败主义的和平观念，关注教育民生，提倡经过他自己重新阐释的儒家思想，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政治抵抗。三个阶段始终都贯穿着他对抗战命运的失败主义的思

4 [加]卜正民著、潘敏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18、12页。

想认识，思考的焦点是如何在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最大程度地保存民族实力和自我的问题。文章最后一部分试图对他出任伪教育官员和提倡儒家思想问题做出新的评价。

我以为，周氏在附逆期间所作所为的背后有着相对稳定的和平观念和原则，他在附逆期间的诸多看似矛盾的选择可以在这一思想原则下得到较为合理的阐释。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1932年又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军进逼华北，虎视平津，进一步入侵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一方面，全国上下抗战的呼声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中日国力悬殊，中国国防薄弱，不少政界、知识界人士认为中国无力支撑抗战，应该主动求和。抗战还是求和，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严峻挑战。周作人无疑是主和的，不过他很少直接议论战争与和平，而是借助于谈论文化、历史问题关注现实。从1932年到1937年，周作人在文章中重点关注了日本问题、对秦桧的评价、民族气节、国民性以及国防实力等问题，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和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悲观预测。

1935年到1937年间，周作人连续写了多篇谈论日本问题或回忆在日本生活的文章，除了《怀东京》《东京的书店》，四篇“日本管窥”和两篇“谈日本文化书”的重点都在于对日本的批判，揭露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恶意。

《日本管窥》一文虽然表达了对于日本故乡式的感情，肯定日本国民性的优点，却意在批评日本人的缺点。他举了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径作为例子。早在1933年10月所作的《颜氏学记》中，他就旁敲侧击地指斥日本右翼的法西斯思想：“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⁵又在《日本管窥》中写道：“我觉得日本这几年的事情正是明治维新的反动，将来如由武人组

5 周作人：《颜氏学记》，《夜读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29页。

织法西斯政府，实际即是幕府复兴”。“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有他的好性质，但是也有缺点，狭隘，暴躁。……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他还抱怨关于日本的文章不好写：“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⁶“日本管窥”第二篇《日本的衣食住》虽谈日本日常生活的美感和自己的爱好，而结尾处陡转：“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⁷有感于“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的矛盾，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之三》中表示，探讨日本文化不应“以学术与艺文为限”，试图扩大考察的范围。⁸到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则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要研究或理解日本文化，不能“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他这样谈到日本对中国的丑行：“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已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却又值得我们的轻蔑。”⁹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差不多要破口大骂了。

最终，《日本管窥之四》离开了前几篇管窥从艺文学术、日常生活方面谈日本，而直击日本现代的武人。他指日本所谓的“大陆政策”其实就是中国所称的“帝国主义”。他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

6 周作人：《日本管窥》，《苦茶随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161-162，166页。

7 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苦竹杂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186页。

8 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三》，《风雨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198页。

9 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其二）》，《瓜豆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62-65页。

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他举出的事例有：藏本事件，河北自治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等事件，走私事件，白面事件等。这些事例，“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来全是反面。”他以比较宗教信仰的方式，从神道教崇拜仪式中寻找原因：“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他指认神道教精神是日本右翼运动的灵魂：“神道教精神……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不妨称之为国粹。……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迷似的不可懂。”他说：“不懂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结果我不得不绝望，声明我不能懂，……这一句话却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窥》四篇这是最有价值的话亦未可知。”图穷匕首现，点出日本右翼的精神支柱和行动上的丑都源自神道教的精神，揭批日本军国主义的非理性。到此，话说到底了，这篇文章便结束，四篇“日本管窥”也就结束了。¹⁰然而，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写了四篇《日本管窥》，将日本的国民性归结到宗教上去，而对于宗教自己觉得是没有缘分，因此无法了解，对于日本事情宣告关门不再说话了。”他的“日本研究”小店就此关门。其实，他是以委婉的方式表示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他后来说在摘抄“日本管窥”而成文的《日本之再认识》中没有“颂圣”，而是“意在讪谤”¹¹。这“讪谤”很好地概括了“日本管窥”的用意。

四篇“日本管窥”显示了高度的文化政治策略，这从文章的结构、手法、修辞等方面均可看出。在当时，谈论日本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周作人在《读禁

10 周作人：《日本管窥之四》，《知堂乙酉文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131-142页。

1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703页。

书》(1935、8)一文中,说到刊于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该文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被认为“不敬”,遭到日方的强烈抗议,主编被判刑。¹²这几年,国民政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压制各种带有抗日倾向的文章。“这些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客气”的言论,尽管看起来既表扬日本的优点,又指出其缺点,似乎两不偏向,然而最后由日本宗教崇拜仪式上神像出巡所显示出的非理性,归结出日本不可知,从而宣布“日本研究小店”关张。这样戛然而止势必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令人警醒。

周作人写于193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的中心主题是揭批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意图和现实丑行,然而还有一个贯穿始终、使人印象深刻的副主题,那就是对日本与中国同为亚细亚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体认,特别是日本贤哲所表达的“东洋人的悲哀”使他产生强烈的共鸣。他在《怀东京》中说:“中国和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实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日本有些法西斯中毒患者以为自己国民的幸福胜过至少也等于西洋了,就只差未能吞并亚洲,稍有愧色,而艺术家乃感到‘说话则唇寒’的悲哀,此正是东洋人之悲哀也,我辈闻之亦不能不惘然。”¹³他始终对日本怀有故乡般的感情,对日本文化也深致敬意,对东亚共同体的梦想难以释怀。

1935年、1936年,周作人替秦桧翻案显然与当时日本大兵压境和周氏自己的失败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其核心的观点是强调议和可以保存民族实力,甚至认为和比战难,主和更需要政治的定见和道德的毅力。

1935年3月,报载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该书指南宋末年大将宗泽、韩世忠、岳飞等的军队“将骄卒惰”;又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

12 周作人:《读禁书》,《苦竹杂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57页。

13 周作人:《怀东京》,《瓜豆集》,76页。

之处”。¹⁴ 教育部通令指责吕持论大反常理，诋岳飞而推崇秦桧。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中引前人俞正燮、朱熹的言论，肯定吕“意思却并不会错，至少也多有根据；而人们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文末引用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中的话：“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¹⁵ 这文末的话才是作者要重点表达的意思，与当时面临的和战情势以及周作人的思想状况直接相关。为秦桧翻案自有思想史、文化史的价值，然而联系周作人后来附逆下水来看则是不祥之音。接着他又在《关于英雄崇拜》中说：“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¹⁶ 《再谈油炸鬼》评论道：“秦桧主和，保留得半壁江山，总比做金人的奴皇帝的刘豫张邦昌为佳，而世人独骂秦桧，则因其杀岳飞也。”“……但见坟前四铁人，我觉得所表示的不是秦王四人而实是中国民族的丑恶……这种根性实在要不得，怯弱阴狠，不自知耻……如此国民何以自存，其屡遭权奸之害，岂非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者也。”他引用朋友的话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¹⁷ 这是周作人在几篇为秦桧翻案文章里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也似乎是本文开头所举废名观点的来源。

与重新评价秦桧问题相关，周氏又指责了不注重事功的偏激的气节观。他对人们崇拜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不满，认为前两者的名誉多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文、史虽有气节，但“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不希望中

14 关于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关于南宋和金朝和战的述论及所引发的风波，可参阅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1935年部分。

15 周作人：《岳飞与秦桧》，《苦茶随笔》，196-197页。

16 周作人：《关于英雄崇拜》，《苦茶随笔》，204页。

17 周作人：《再谈油炸鬼》，《瓜豆集》，213-214页。

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¹⁸《英雄崇拜》一文说，崇拜英雄本来也是一件好事，不过英雄的行为应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他们的是可以佩服，第二是可以做模范”。而关羽、岳飞只是尽职的武将，他们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小说的关系。时人崇拜文天祥、史可法，两人的忠烈固可佩服，但中国未亡，需要的是“救亡扶危”的英雄。在他看来，这四人的事迹均不足法，于是推出越王句践与大夫范蠡，特别标举他们报仇雪耻中所表现出的“坚忍”。这种品格正与现实“大都轻躁、浮薄和虚假”的各种运动形成鲜明的对照。越国君臣堪为模范的还有一点，“即是他们的沉默，不乱嚷，不空宣传”¹⁹。这表扬他们的韬晦和脚踏实地。国难当头，而现实中中国上下所表现出的喧嚣、轻躁、虚妄等使他忧愤难平。

在《颜氏学记》中，周氏指气节“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颜元《性理书评》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焯）祭其师伊川（劼雍）文，周氏说“习斋所批首数语虽平常却很有意义”。颜文云：“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仓惶久之。”周作人说：“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其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全去’亦何以异哉。”²⁰

1935年6月，周作人写作了《醉余随笔》《责任》两文，由遗民的话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前者引用洪允祥一则随笔中的话：“《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

18 周作人：《关于英雄崇拜》，《苦茶随笔》，204-205页。

19 周作人：《英雄崇拜》，《周作人集外文》（下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445-446页。

20 周作人：《颜氏学记》，《夜读抄》，28-29页。

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一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²¹ 后者由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引出他对救亡责任的思考，再引洪允祥《醉余随笔》中的话。在几篇关于遗民的文章里，周氏引人注目地提出“气节”问题。他没有否定气节的价值，甚至对顾炎武表现出的气节表示赞赏，只是如《颜氏学记》所说反对那种偏激的气节说，所以他要对气节进行了限定。比如在《责任》中提出了几条责任，“一是自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忘说，误人子弟，该当何罪，虽无报应，难免灰心，但当尽其在我，锲而不舍，岁记不足，以五年十年计之。三十言行相顾。中国不患思想界之缺权威，而患权威之行不顾言，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与陪姨太太者引导青年，同一可笑也。无此雅兴与野心的人应该更朴实的做”。²²

不同的气节观显示出面对国家危亡之间时两种对和平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式的拒绝，一种是忍辱负重的坚持，——甚至不惜与敌人协力，争取和平的空间和时间，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国家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周作人担心过于强调气节，缺乏韧性，容易导致失去和平的机会，不利于民族的自我保存。

周作人认识现实，往往由历史现象作参照，这是其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他在北大发表了一次关于征兵问题的演讲。除了谈论现实的征兵问题，还谈及抗日乱象所反映出的国民性问题。“近来中国不知道从那里得来了一件谬误思想，迷信‘公理战胜’，与原有的怯弱，取巧等等劣根性相结合，这是一个大错。”当兵需要诚意，不是简单地穿上漂亮的军服，威风像一名勇士，还得不怕苦，不怕死。“我觉得我国人缺少的便是诚意，上上下下都是你骗我我

21 周作人：《醉余随笔》，《苦竹杂记》，19页。

22 周作人：《责任》，《苦竹杂记》，225-226页。

骗你，说谎，用手段、取巧”²³。有几个地方训练壮丁，用意与待遇未始不好，然而有些农民宁愿逃亡，流落外地作苦工，却不肯在乡里训练拿工资，原因是不相信。定县农村说全村的户口有多少，但官厅的记录则更少，因为各种支应摊派按户口计算，这也是不信任的例子。²⁴

现实的乱象、败象使得周作人痛感国民性遗传之可怕。《关于命运》云：“好几年前我就劝人关门读史，觉得比读经还要紧还有用，因为经至多是一套准提咒罢了，史却是一座孽镜台，他能给我们照出前因后果来也。我自己读过一部《纲鉴易知录》，觉得得益匪浅，此外还有明季南北略和《明季稗史汇编》，这些也是必读之书，近时印行的《南明野史》可以加在上面，盖因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且不谈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等，只说八股和党社这两件事吧。……明季士大夫结党以讲道学，结社以作八股文，举世推重，却不知其于国家有何用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功令的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另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与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文章结尾处引用日本的一首小诗：“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²⁵在该文中，“业”指的就是一种遗传的国民性。《苦茶随笔·后记》写道：“五月三十一日我往新南院去访平伯，讲到现在中国情形之危险，前日读墨海金壶本的《大金吊伐录》，一边总是敷衍或取巧，一边便申斥无诚意，要取断然的处置，八百年前事，却有昨今之感，可为寒心。”²⁶周作人从野史、笔记上关于晚明的图像来对照现实，从而指斥现实的败象，表现出浓重的悲观情绪。

周作人又以遗民的文章所记明末的乱象与现实相对照。《拜环堂尺牍》抄录

23 周作人：《关于征兵》，《看云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166-170页。

24 周作人：《弃文就武》，《苦茶随笔》，13页。

25 周作人：《关于命运》，《苦茶随笔》，122-127页。

26 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219页。

明末陶崇道尺牍，反映出当时敌强我弱，一片败象，而“朝士作高奇语”。周作人解释道：“高奇语即今所谓高调，可见此种情形在三百年前已然。”²⁷他在《苦竹杂记·谈禁书》再引拜环堂尺牍，认为所述当时的情形与现今颇为相像。周作人于1933年1月14日致曹聚仁的信，信中说：“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十日来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静了一点下来；如不佞等觉得无可逃，则仍未逃耳。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骄之气太甚，窃意丧败无妨，只要能自省，知道自己的缺点何在，可望复兴。……五四时自己谴责最急进者，（原刊此处留有六字空白——引者）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他们虽似极左，而实在乃极右的一种国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为遗传学说（古人所谓‘业’）所恐，睹此更为栗然。中国如亡，其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一则断然为此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可无疑也。此刻现在，何处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来或不来，此或亦虚无主义之一支配！”²⁸历史与现实惊人地相似，话说得很沉痛。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到七七事变之间，周作人写了二十来篇关于遗民及其遗民著作的文章。在国家危难之际，周作人借对遗民生活及其言行的思考，执着地想着亡国后个人的选择，其背后反映出他对民族前途深刻的悲观和焦虑。

六朝人中，周作人最钦佩的是陶渊明和颜之推。颜之推一生中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后又入隋，三次经历亡国。周氏特别珍重《颜氏家训》，称该书，“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²⁹他特别对明朝遗民有好感。《关于傅青主》引傅山关于乱世之道的話，评价道：“遗老的洁癖于此可见，然亦唯真倔强如居士者才能这样说，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³⁰江南名士叶天寥日记详尽记述其隐居生活，“可以见其闲穷与闲适之趣”³¹。周对叶在亡国后的生活的艺术表现出深刻

27 周作人：《拜环堂尺牍》，《苦竹杂记》，52页。

28 曹聚仁：《跋知堂两信》，1934年10月20日《人间世》14期。

29 周作人：《颜氏家训》，《夜读抄》，119页。

30 周作人：《关于傅青主》，《风雨谈》，7页。

的同情和兴致。也许周作人写这些文字未必都是因为时局，然而由于所面临的惘惘威胁，明朝遗民的人和文对他便有了特别的吸引力。周作人写移民的文章，反映了他试图寻找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之艺术。他在这些文章中对移民们个体的自我保存予以肯定，而不是把气节放在优先的地位。

郑振铎文章《惜周作人》是研究周作人附逆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他记下了在七七事变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谈话，周作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持“必败论”，这是他堕落下水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军力量的巨大。”³² 郑振铎的记述是可信的，因为可以从周作人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充分的印证。周氏在《弃文就武》中向当局提出质问：“第一是想问问对于目前英美日的海军会议我们应作何感想？日本因为不服五与三的比例把会议几乎闹决裂了，中国是怎样一个比例，五比零还是三比零呢？其次我想先问问海军当局，……现在要同外国打仗，没有海军是不是也可以？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得一国的海军消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战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战也是如此。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³³

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而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国民性的痼疾又根深蒂固，几个方面因素合起来就产生了他的必败论。正因为如此，他才急于替秦桧翻案，为议和正名，对偏激的气节论提出质疑。

周作人对本民族抗战持“必败论”，他无疑是主和的。在1934年7月6日致梁实秋的信中，周作人说：“本来想一说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又觉得大可不必，

31 周作人：《甲行日注》，《夜读抄》，127页。

32 郑振铎：《惜周作人》，1946年1月12日《周报》19期。

33 周作人：《弃文就武》，《苦茶随笔》，135-136页。

故复终止。”³⁴简单的一句话，却实实在在地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可能正是由于这个主张，他还试图与左翼作家和解。他在《苦茶随笔》的后记中说：“我以前以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新党朋友颇怪其统一思想等等运动建筑基础，至于党同伐异却尚可谅解，这在讲主义与党派时是无可避免的。”³⁵在日本占领东北、紧逼华北之时，提及“和日与共”，说明与日本议和是他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上面所谈日本研究、对秦桧的评价、民族气节、国民性以及国防实力等问题都与他的主和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主和思想是他认识和评论这些问题主要的思想语境和原则。这些问题或者揭示失败的不可避免，或者试图回答在失败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应该何为。

在抗战爆发前后，与周作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因而支持议和的知识界和政界人士大有人在。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王世杰在1937年8月3日日记中记：“二、三日来，首都一般人士，感觉身家危险，有知识者则对国家前途不胜恐惧。故政府备战虽力，而一般人之自信力仍日减。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又说：“胡（适之）、周（枚荪）、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为之。”³⁶这种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朝野上下蔓延，“八一三”事变后还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主和派的“低调俱乐部”。胡适也是这个由周佛海主持的团体之一员。

据陈公博回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对1932年“一·二八”之战、1933年古北口之战原是主张抵抗的，但古北口之战又让汪深受刺激：“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因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³⁷他的对日方针便从“一面

34 梁实秋：《忆岂明老人》所附“岂明老人原函墨迹之二”，1967年9月《传记文学》（台湾）11卷3期。

35 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220页。

36 林美瑞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28、29页。转引自李志毓：《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政治环境及其思想脉络》，《安徽史学》2015年3期。

抵抗，一面交涉”转向重在交涉。抗战爆发后，开始形成他的“和平论”思想。广州、长沙相继失陷后，其“和平”的意见更加坚决，并付诸行动。³⁸ 曾仲鸣遇刺身亡后，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中坚定了他“和平”的思想信念：“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百年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³⁹ 于是，汪开始了他的政治豪赌，建立傀儡政权。

陈公博说汪精卫：“他总以为中国国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不妨讲和平。……他总以为日本总说中国没有诚意，我现在表示极大的诚意，这样可以成立中日间的真和平。”⁴⁰ 周作人显然不一样，他始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意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才通过陶希圣转告汪精卫不要上当受骗。据陶希圣回忆，他在从河内到香港时，派武仙卿前往北平，考察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形，特别访问了周作人。周氏对武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字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他还托武给陶带口信：“干不得。”⁴¹ 周作人在1963年致鲍耀明的信中又说：“当时有周化人氏曾来访问，我告以日军人素不讲信用，恐难合作，便嘱为转告汪君，请其慎重，但不久而‘国府还都’。于事实毫无补益也。”⁴² 这些材料很可以见出周作人对日方的警惕和敌意。

然而，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汪精卫对日和谈的政治主张之间是有着相通之处

37 陈公博：《自白书》（1945年11月），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3页。

38 参阅汪精卫：《复华侨某君书》（1939年3月30日），收入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391页。

39 汪精卫：《举一个例》，《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南京：中央电讯社1944年9月编印，13页。

40 陈公博：《自白书》（1945年11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34页。

4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161页。

42 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258页。

的，这或许在一定的程度上促成了他日后与汪伪政权的合作。

二

联系周作人对抗战前途的失败主义的预测，更容易理解他在七七事变后“苦住”北平的抉择。如果失败是一定的，那么逃亡有什么意义呢？结果是一样的，只是徒增颠沛流离之苦而已。

周作人强调的理由是“家累”的羁绊。他在1937年8月6日致陶亢德的信中说道：“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幸得无事，可以告慰。”8月20日信仍谓：“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⁴³他后来还在致徐訏的信中具体解释了他的“家累”情况⁴⁴。在给胡适的打油诗中也强调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而只好“苦住”。郑振铎《惜周作人》记，“七七”以后许多人劝周南下，他托辞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郑振铎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京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⁴⁵八道湾舒适的起居和良好的读书环境当是周作人特别留恋的，通过读书，他建构了一个旷代相感的乌托邦式的“朋友圈”，那是他的精神家园。

选择“苦住”北平，偶尔与日伪方面的人有些与政治关系不大的来往，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下水事故。不论是周作人，还是其他附逆者，他们的下水通常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经历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观望、等待、试探、决定的过程。抗战形势的变化直接牵动着他们的抉择，特殊的事件或人际关系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推上一把。

在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上，汤尔和（1877—1940）是个关键的人物，他堪称周氏附逆的引路人。正如止庵所言：“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汤尔和是极少数对他

43 亢德：《知堂先生在北平》，1937年11月10《宇宙风》50期。

44 周作人：《致徐訏书》，1968年1月《笔端》（香港）1期。

45 郑振铎：《惜周作人》，1946年1月12日《周报》19期。

产生重大影响，使之追随其后的人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充分了解北平沦陷后的汤尔和，就无法真正理解同一时期及其后的周作人。”⁴⁶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是一条认识周作人附逆动机的方便途径。1938年8月，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汤尔和被选为会长，周作人成为该会委员，后又于1941年10月担任会长。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之后，周很快就从兼任伪北京大学校长的汤尔和手中接过图书馆馆长和文学院院长的聘书，这两个职务是他走向伪教育总署督办的过渡。据周作人1939年日记所载，本年度他与汤尔和交往甚密，其中周作人访问汤尔和有十八次，汤请饭七次，收信六封，发信五封，诗歌唱和一次，受赠礼品一次，请托二次，别人传达口信一次。对汤称呼最多的是“尔叟”、“尔和”⁴⁷，显得亲切而又尊重。不难想见，周作人出任伪职是他们交往中的中心话题。

汤尔和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降，他是一个穿梭于政、学两界的人物。1912年，创立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担任校长。又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担任会长。在北洋政府担任过教育总长、内务部总长和财政总长等要职。1937年12月，他参与组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任教育部总长兼议政委员会委员长、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还兼任伪北京大学校长。汪伪政权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继任该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任职期间，他积极重建华北沦陷区文教系统，筹建大专学校，设立审定中小学教材的编审会，成立东亚文化协议会并被选为首任会长。种种迹象表明，他是推动周作人出任伪职的一只有力的大手。周作人在受审时，《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也指认他“受汤尔和之怂恿”，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和文学院院长。⁴⁸周作人后来只是说战前虽是同乡，但是很少和他接触，“只知道他是个很世故，善谈谐，且颇有点权谋之术的人。”⁴⁹而回避了北平沦陷后彼此

46 止庵：《重提关于周作人的一些史料》，《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3期。

47 周作人：《1939年周作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11期。

48 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1385页。

49 周作人：《“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文史资料选辑》第13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6月，158页。

间的密切交往。

幼松著《汤尔和先生》一书说，汤尔和于1940年因病重，在万寿山养病，每日到昆明湖畔。第十九章提到，他有一篇吊耶律楚材的文章，刻在湖边耶律楚材墓内的墙壁上”。⁵⁰这所谓“文章”其实是两首七律，题为《吊耶律楚才墓》，为窥探汤氏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诗云——

一代通才泣鬼神，髯人赐号不称名。直言深信遭英主，苦口真能救众生。
礼教从来关治乱，恩仇到底总分明。元家陵寝今何在，独向南湖吊晋卿。
嗜杀君王共事难，录囚决狱总从宽。长余涕泪无余粟，多予金钱不予官。
兴利何如先去宅，引觞莫若且加餐。仁风劲节千年在，留与英雄作镜看。

诗前有小序云：“楚材辽东世胄，为元祖所识拔、顾爱斯民有如赤子，仁人不杀，功德长存。”⁵¹耶律楚材世代在金朝为官，蒙古灭金后，因才华出众而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重用，官至中书令（宰相）。这两首诗作于1938年间，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诗中写了耶律楚材救济汉族民众、任用中原名士，称赞他道德、事功兼备。汤尔和在吊诗中显然是以耶律楚材自况，为自己出任伪职辩护的。

周作人与汤氏在履历、志业、能力和性格上都迥乎有别。然而，在沦陷的情势下，两人走到一起，他们对下水事伪的考量颇有相通之处。他和汤氏都标榜自己关心民生和治乱。汤尔和死后，周作人作挽联：“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发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檀度中断，伤心跌打胜微言。”⁵²其中，表彰了汤氏的“经国事功”和“救民苦难”。

50 幼松：《汤尔和先生》，北京：金华印书局1942年10月印刷，178页。据瞿兑之《读〈汤尔和先生〉》（1943年7月《古今》27、28期合刊），“幼松”为汤尔和次子汤器。

51 诗及小序引自胡文辉：《沦陷语境中的耶律楚材——汤尔和的心事》，《掌故》第三集，徐俊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1月。

52 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598页。

胡文辉指出汤尔和在吊诗中所表现的“心迹”并非孤立。沦陷区文坛的附逆文人柳雨生后来写过论文《元代蒙古人汉化问题及其汉化之程度》，为耶律楚材辩护：“楚材所以降志辱生，不为桀溺之避世者，则以生丁乱世，目睹人民水深火热之痛苦，欲为稍纾其难，庶免载胥及溺耳。”⁵³ 沦陷区刊行《国学丛刊》第五册（1941）“课艺选录”一栏，有两篇《耶律楚材论》，都是盛赞其功的。《国学丛刊》由国学院第一院主办，其后有伪官方背景，得到华北政务委员会首脑王揖堂的支持。两篇“赋得”式文章的用意与汤尔和、柳存仁等人相同。⁵⁴ 附敌者常以救国济事高自标榜，为其附逆辩护，这是需要细加注意和甄别的现象。

关于汤尔和其人和他在沦陷前后的表现尚缺全面而翔实材料，不过《汤尔和先生》一书有所记述。1938年，汤发表元旦广播讲话，为争取青年，他说：“我辈惟知补救一分，留得一分元气，少死一青年，即为国家保存一有力分子。”汤网络各种专门人才，有的人尚在观望，他便劝说：“国家元气，能保存一分是一分，责无旁贷。这是什么时候了，还好袖手旁观吗？我尚且如此，何况你们？”“他设立编审会，审订中小学课本。他说小学儿童，如同一张白纸，不应该让他染上政治色彩。所以凡是排外媚外的思想，都不应当入课本中。”类似的劝词周作人大概没少听到吧，他后来在受审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汤氏不免遭到时人物议，而他自己却说：“是非功罪，在百年之后！”⁵⁵

1937年5、6月间，汤尔和在其主编政论性的《舆论周刊》上发表过四篇时评。除了发刊词《开宗明义》外，其余三篇均涉及中日关系。他说：“我对于中日间的事情，素来注重全局，说得夸张些，就是着眼于东亚百年之计。区区抱负，既然如此，所以三几年内的是非毁誉，在我心目中，好比天上浮云，丝毫不足介意。”⁵⁶ 1937年6月，近卫文磨受命组阁，汤希望近卫改变中日关系现状，“于对华外交，大胆迈步，走向沉着，光明，和平，互让的一条坦道。”这样可望取

53 柳存仁（柳雨生）：《和风堂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591页。

54 参阅胡文辉文。

55 《汤尔和先生》171-176页。

56 汤尔和：《日本应率先抛弃在华领事裁判权》，1937年6月7日《舆论周刊》1卷8号。

得中国人的几分信任，由几分信任而走向了解，从而解决两国间的纠纷障碍。同时，中国人也需自我检讨，认清日本与西洋之间孰亲孰疏，孰远孰近，谁是贡献世界和平的长途旅行中的伴侣。⁵⁷从几篇文章略可见出他的亲日梦想，甚至为了这个梦想，不惜铤而走险。文章中踌躇满志之态可掬。这很可以解释抗战爆发不久，他就积极投入与敌人合作的思想原因。

1941年4月14日，周作人以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的身份参加在东京召开的该会前会长汤尔和的追悼会。他在致词中称赞汤氏：“事变以后，立刻坚决地主张非复兴文教不可，不顾危险挺身而出的，只有汤先生一人而已。”⁵⁸又在《〈汤尔和先生〉序》中说：“汤先生一生中治学与为政相半，其参与政事的期间差不多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若是办学则三十年来与医学不曾脱离，中国现在仅有的一点医药新学问的基础，可以说全是由汤先生建筑下来的。”⁵⁹周与汤一样，都是文教界中人，他们在恢复和维护文教方面的努力也是一致的。

汤尔和不论在敌伪人员中，还是在沦陷区人士中，都有很高的声望。⁶⁰与汤氏的频繁交往，可让周作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既可自我保存，又能在安全的阈值内为本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即便说消极抵抗不是周氏的主要动机，那么步武汤氏至少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从而减轻道德心理上的压力。

据曾在伪临时政府从事地下工作的陈涛回忆，1938年春，伪教育部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会成立，“中日双方人员见面时，日方总编纂即提出教科书应加入并宣传‘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最后由汤尔和表示教科书应以传授知识为主，最好不要把有倾向性的政治色彩的东西装进去，加入‘新民主主义’事可暂不

57 汤尔和：《与近卫文磨公晤谈之追忆及感想》，1937年6月28日《舆论周刊》1卷11号。

58 姜德明：《周作人谈汤尔和——关于周作人的两篇佚文》，《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6期。

59 幼松：《汤尔和先生》。

60 汤氏在教育方面做成很多大事，说明他得到了日方的信任和支持。他敢于当着日本人的面指责日方，参阅《汤尔和先生》73-74页；他也得到沦陷区一些教育界人士的积极评价，参阅《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附件一《周作人服务伪职之经过》，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

考虑。……汤病故由周作人继任教育总署督办后，也没有旧事重提。”⁶¹ 可谓萧规曹随。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一书《安藤少将与周督办》一节记述，有一次大概是预备庆贺日军占领宜昌，日伪方面动员民众和学生们参加。“周氏以为学生总应离开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弘旨。署中就根据这个交谕，转告市政府教育局，和直辖各大学知照。次日，各校照例放假一天，却没有一个学生预备到会。”任伪新民会顾问的安藤少将大怒，要带卫兵亲自去抓周作人，幸亏日本大使馆的一等参赞在场劝阻，才把安藤拦住。⁶² 这里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理由与他的前任汤尔和相同。

周作人下水事伪与汤尔和直接相关。据敌伪时期在伪北京高校任职的徐祖正等人的说法，汤尔和之所以坚邀周作人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长、文学院院长之职，是“深信周氏足以应付日寇故也”。“三十年伪教育总长汤尔和以病逝世，继任乏人，汤氏在临终前即属意于周，各方亦盼周氏出任较为妥善。”⁶³ 周作人自己说：“及汤尔和病死，教育总署一职拟议及我，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因为当时华北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全在总署的手里，为抵制王揖唐辈以维护学校起见，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⁶⁴ 如果他没有与汤尔和交往，或者汤尔和没有在督办的位置上病死，那么周作人很可能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周在1964年7月18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⁶⁵ 周作人所言大体上是可信的。1980年代中后期，发生一场关于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问题的风波，受到过广泛的注意。1941年11月，汤尔和病逝后，谁将继

61 陈涛：《陈涛同志致鲁迅研究室的信》，《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62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3月，16页。

63 《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附件一《周作人服务伪职之经过》，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1394-1395页。

64 周作人：《周作人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87年2期。

65 周作人：《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年5月，10页。

任受到多方的关注。当时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许宝骥叙述了参与游说周作人出任教育总署督办的经过。在日方一派力量的支持下，“国民党党棍、现新民会混混儿”缪斌钻营督办之职甚力，伪政权中也有人属意于周作人。⁶⁶他与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张东荪在一次“三人碰头会”上，决定让已是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后由许去游说周氏，周作人应允。王定南发表《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针对周任伪教育督办一事，说他曾与北方救国会另两个负责人张东荪、何其巩在何家的一次谈话：“何其巩、张东荪对我说：‘伪教育督办汤和死了，周作人（伪北京大学校长或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缪斌（伪新民会会长）二人活动要当教育督办，周是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我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我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们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⁶⁷两人的说法不一，但都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了抵制缪斌，游说周作人出任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自己所说“觉得有占领之必要”的“大家”，“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应属实情。

地下工作人员的游说很有可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后由谁来填补教育总署督办之缺只能由日本人拍板。曾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对周作人的劝诱工作就是由这个部的文化局承担的）工作过的志智嘉九郎这样说周作人下水：“若是他坚决不接受也不能勉强为之的，因此我觉得劝诱工作做得很顺利”⁶⁸。

迄今尚无证据表明周作人出任教育督办是因为受到胁迫，这样一来，明明知道日方不值得信赖，但还要下水合作，这种动力到底来自何处？周作人自己说得

66 许宝骥：《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此文首先发表于1986年11月29日《团结报》，另见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2期。

67 王定南：《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1987年2月20日《山西政协报》，另以《我对于国内外报刊发表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为题，刊于《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3期。

68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8月，123页。

很含混。木山英雄说：“对于出马的理由的说明尽管未免乏味，而出马与否只要不是涉及精神上的死活问题，则某种决定性的理由终归不会存在吧。因此，或许还可能有另外一些说法，但总之一政治上的考量使他行动起来，大概是事实吧。所谓‘政治上的’，并非斗争性的意思，而是意味着即使可能存在屈辱的妥协，但面对已不可能与之善意合作的眼前‘敌人’才做出的判断。我认为，这个时期周作人的决断中无论何种意义上的‘亲日’幻想都是不存在的。”⁶⁹在我看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出于某种抵抗政治的需要，二是个人可以在冒险中受益。1925年1月，他在《元旦试笔》中说过：“我不相信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倾向，并不想到青年中去宣传。”⁷⁰ 这话说得很明白，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中，他是把个人摆在第一位的。所以，他对个人利益的考量不言而喻，本来他滞留北平就是出于自我的考虑的。在很大程度上，两种可能性并存。也许正是两方面因素缠绕在一起，才使他后来感到难以申说。

另外，汪伪政权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尽管是傀儡政权，还是可以为其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提供一个借口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在失节问题上的心理压力。虽然周作人与汪精卫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但两人之间在失败主义的和平思想等方面是有相通之处的。他们之间关系予人以惺惺相惜之感。1942年5月，汪率随员访问“满洲国”，在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仅选周氏一人同行。随后，周作人应汪之邀访问南京，并在伪中央大学发表“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演讲。4月26日写作《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其中有云：“唯三十余年来读其文章，观其行迹，自信稍有认识”⁷¹，恐非只是应酬之语。至少在战争全面开始后，周氏出于对局势和自我前途的关注，会特别留意汪作为主和

69 [日] 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127页。

70 周作人：《元旦试笔》，《雨天的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140-141页。

71 周作人：《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1942年6月《古今》4期。

派代表人物的一言一动的。他们对抗日前途的黑暗预测，对“议和”的主张，以及在言论中对“中国”利益的一再强调都是一致的。这样，就会在政治上彼此靠拢。

周作人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称自己附敌的动机：“被告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⁷²而在《知堂回想录》中又有意回避。他在《读〈东山谈苑〉》（1938）、《辩解》（1940）以及《知堂回想录》中一再称引“倪云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的故事，给他附逆的动机贴上了封条。黄裳曾往南京老虎桥监狱采访周作人，质疑他一向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为何在法庭上又说了那么多不免于“俗”的话。黄文写道：“这很使他有些嗟喟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不能不答辩云云。”⁷³如果真像他在法庭上所申言的那样，在敌伪时期无法正面言说，那么在战后是完全可以提供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证据的。只是他明白徒说无益，关键是要拿出真凭实据。

三

周作人走上了一条投降主义的“和平”道路。一方面不得已地与敌人合作，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民族的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实力不外乎人力物力的和思想意识的两个方面。出任伪职特别是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以后，他一方面履行职责，有过许多政治表演；另一方面也进行一系列的消极抵抗，做过一些有利于保存本民族人力物力的具体事情。他在任伪职期间消极怠工，做过一些有利于民族的具体事情，如保护北京大学校产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救助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帮助李大钊几个参加革命的子女等等；特别是出于抵制殖民思想的政治需要，提倡经其重构过的以禹稷为模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中国固有文化。⁷⁴这后一点，最为周氏自己所看重，他后来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在晚年所

72 周作人：《周作人辩诉状》（1946年7月15日），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1400页。

73 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锦帆集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4月，237-238页。

作的回忆录里都特别地强调。

周氏提倡中国思想的文章，以收入《药堂杂文》的《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为代表。其中三篇题目中的“文学”指的是杂文学意义上的“文章”，文中所引用的文本大都是传统的子类，所以实际上等于说是中国的思想，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另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的主题一致。它们高标了“汉”“中国”这两个核心的民族国家语言符号，特别是突出“汉”字，更加强调了中国文章的主体特征。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汉文学的传统》《汉文学的前途》，“题目称汉文学却颇有点特别，因为我在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所以将这来代表中国文学。”⁷⁵ 几篇文章的写作有着很强的当下问题指向。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在社会上大力推行“尊孔祭孔”的儒教运动，在学校中提倡“尊孔读经”。1938年2月，为了所谓“阐扬圣教”，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发布命令，仍以夏历8月27日为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恢复春秋上丁两祭。次年，伪临时政府颁令：祀孔典礼如有失仪延误者，还要受到惩罚。⁷⁶

日方的宣传人员发表文章，试图把日方的战争意识形态注入“孔子的学说”中。中山久四郎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孔子学说在“尚武精神”、尊重君臣大义、重视“忠臣不事二主”上面，都与日本道德同出一轨，所以中日两国很容易“在精神上提携”。⁷⁷

神谷正男的文章《大陆思想战与儒教运动》原在日本发表，更是赤裸裸地表明了日本方面借助儒教运动开展思想战、服务于“大东亚战争”的企图。文章从思想战的重要性、大陆思想战的经过、儒教复兴运动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具体

74 参阅黄开发：《周作人精神肖像》，50-54页。

7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725页。

7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384页。

77 [日]中山久四郎：《日本之道与孔子之教》，1942年9月《政治月刊》4卷3期。该文另载1942年9月《民意》3卷8期、1942年9月《江苏教育》4卷6期。

的方策等方面，系统、清晰地论述了题旨。他阐明了思想战的性质：“大东亚战争的展开，而于内外的思想战，有决定的影响，将其性格予以明确的规定，这便是英美对于皇道的决战，广义言之，也就是西洋民主思想对于东洋思想的决战。”“思想战之终极目标，无非将本国之思想完全同化，因此，大陆思想战的终极目标，把现代中国的思想，必须与皇道相融合同化。”他很清楚，倘若直接宣传“皇道”，难以被中国人接受，容易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就需要勃兴儒教运动作为过渡的桥梁。儒教运动的重要意义有二，“第一，即向来堕入英美自由主义的大陆思想战之方向，现在复兴于中国固有的思想源流……第二，儒教复兴在中国之思想的传统复兴上，为必要的条件，同时儒教复兴即为皇道宣布之媒介，质言之，大陆思想战之本质，便是皇道对英美思想的决战，因为皇道和儒教的关系，密接不离，故复兴儒教便是大陆思想战的直接方法，在皇道宣布上负有重大的思想任务，这是儒教复兴的第二意义。”⁷⁸

神谷正男指近代中国已经全盘西化，堕入英美的自由主义，儒教思想的势力式微，所以要发动思想战，复兴儒学，传播皇道，与英美思想决战。这是日伪的主流意识形态。新民会中央全会机关刊物《新民报》半月刊的《发刊词》中，把中日战争视为中日国民对“扰乱秩序之党共恶魔”的膺惩之战，又是东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总决战，换句话说，“即吾东洋人之王道主义”对于“西欧个人主义”的肉搏战。⁷⁹在日伪意识形态的视域中，深受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自然是其思想战的敌人，是“儒学”取而代之的对象。

周作人对日本人的意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旨在使中国沦为殖民地，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铲除中国的民族意识，从语言和思想两方面入手来使中国人“皇民化”，就像他们在朝鲜和台湾所做的那样。早在留日时期，周作人就说过：“国民者，有二要素焉：一曰质体，一曰精神。质体云者，谓人、地、时三事。

78 [日]神谷正男作、李云译：《大陆思想战与儒教运动》，1943年6月15日《新民报半月刊》5卷12期。

79 《发刊词》，1939年6月1日《新民报》半月刊1卷1期。

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礼俗，居有土地，废世守之，素白既具，乃生文华。之数者，为形成国民所有事，亦凡有国者所同具也。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之有魂气。”⁸⁰ 国民精神是国家存在的根基，如果国土失陷，制度变更，人民再失去本民族的思想意识，那么就彻底亡国了。所以，守住了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就是保住了“国魂”。周作人文化抵抗策略体现了他与早期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所不同的是留日时期他要求“摈儒者于门外”⁸¹，此时则借取儒家思想的话语形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融入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抵制日伪方面发起的思想战。

周作人晚年说：“那篇文章（指《中国的思想问题》——引者）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⁸²。这“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在一次官方性质的笔谈中，周作人也以伪职的身份参与宣传所谓的“中心思想”：“现在最要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⁸³这时的周作人是双面的。在个人的场合，他又把锋芒直指日伪方面宣传的“中心思想”，引用章太炎的话讽刺日本方面把自己的私货强加于人⁸⁴。最重要的是提出警告，即中国人是现世主义的，当他们的生存意志遭到阻遏时会铤而走险。这种保存实力的观念是在认定失败的前提下形成的。他发表关于中国思想问题的系列文章以当下的问题意识为指向，关注的焦点是沦陷区的民生问题，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以何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他独辟蹊径，从禹稷的身上寻找原始儒家的源头。他说中国固有思想是先于孔孟的，而不是到了孔子才设道传教。《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显示了高度的文化政治斗争的策略，运用话语修辞，隐含斗争的锋芒。既关注现实民生，又守卫中国固有思想，意在一箭双雕。

80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年5、6月《河南》4、5期。

81 同上。

8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729页。

83 周作人先生等：《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1942年6月《中国文艺》6卷4期。

84 知堂：《汉文学的传统》，1940年5月1日《中国文艺》2卷3期。

周作人在《汉文学的传统》一文中宣称：“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是古来的儒家思想。”并把它命名为“儒家的人文主义（Humanism）”。⁸⁵概念后面附注英文单词，这在周作人的文章中是极为少见的，意在暗示与西方近代思想的关系。他在引证《孟子》《易余龠录》等典籍后说：“中国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便暂时枯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压，或是助长。你说起儒家，中国是不会有迫压出现的，但是助长则难免，而其害处尤为重大，不可不知。”⁸⁶这段话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当时日伪方面以儒家话语来对其意识形态乔装打扮，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妨害。

周氏一再强调中国固有思想没有问题，是很健全的，前途光明，他对此感到乐观等。他把自己所谓的“儒家思想”定义为“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⁸⁷他写道——

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不能入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我尝查考中国的史书，体察中国的思想，于是归纳地感到中国最可怕的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我们只就近世而论，明末之张李，清季之洪杨，虽然读史者的批评各

85 同上。

86 同上。

87 知堂：《中国的思想问题》，1943年1月《中和月刊》4卷1期。

异，但因为一种动乱，其残毁的经过至今犹令谈者色变，论其原因也都由于民不聊生，此实足为殷鉴。中国人民平常爱好和平，有时似乎过于忍受，但是到了横绝的时候，却又变了模样，将原来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云外，反对的发挥出野性来……现在我们重复的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在政治而不在教化。⁸⁸

此段文字强调了中国人现世主义的生存哲学，并与愿意为神道牺牲的日本国民进行了对比，对日伪方面提出警告，近乎公然的指责。

周作人还提醒当心异己的外国思想成分的入侵。《汉文学的前途》说：“吾人吸收外国思想固极应慎重，以免统系迥殊的异分子之侵入，破坏固有的组织，但如本来已是世界共有的文化与知识，唯以自己的怠惰而落伍，未克取得此公产之一部分，则正应努力赶上获得，始不忝为文明国民，通今与复古正有互相维系之处。”⁸⁹其中是有具体的暗示的，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要阻击；他谈到汉文学的前途时又强调思想文化要开放：“将来新文学之伟大发展，其根基于中国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于世界的新兴学问之培养者亦半”。⁹⁰“世界的新兴学问”无疑包括西方文化，这又与日伪势力把西方文化视为思想战的敌人迥异。

《汉文学的前途》说：“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这是又一个问题。”⁹¹其实四篇文章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要找出这种精神联系的核心成分，这自然非儒家思想莫属。儒家思想既有现实的“合法性”，又面临着被歪曲的危险，所以他才在“合法性”的话语形式下，通过话语修辞，确定符合中国人立场的内涵，因而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性。

周作人强调作为一个民族知识分子对于本民族思想文化传承和建设的质量。

88 同上。

89 药堂（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

90 同上。

91 同上。

他在《自己所能做的》一文中说：“凡是中国人不管先天后天上有何差别，反正在这民族的大范围内没法跳得出，固然不必怨艾，也并无可骄夸，还须得清醒切实的做下去。国家有许多事我们固然不会也实在是管不着，那么至少关于我们的思想文章的传统可以稍加注意，说不上研究，就是辨别批评一下也好，这不但是对于后人的义务也是自己所有的权力”⁹²。

1928年以后，周作人退回书斋，甚至予人以隐士之感，这与他在沦陷时期要给人塑造的忍辱负重、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反差甚大。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引用《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乱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异地则皆然。”⁹³“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似乎正是他对自己矛盾的形象进行阐释和辩护。由“己溺”“己饥”而推及于人，做出有利于生民的事业，这是体现出仁人之用心的仁政，与其五四时期所提“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有着一致性。

《汉文学的前途》还高度肯定了“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对“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维系之力”，特别是汉字在连络民族思想感情上的重大作用。他有意撇去了“旧派”所热衷的古文，指出语体文“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⁹⁴早在1936年6月，在中国面临着被征服和分裂的情势下，他就在给胡适的信中特意强调国语、汉字和国语文对于维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特殊作用。他写道：“我说要利用国语与汉字……用时髦的一句话说，现在有强化中国民族意识之必要，如简单的说，也就

92 周作人：《自己所能做的》，《秉烛后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12年2月，6页。

93 知堂（周作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1943年7月《艺文杂志》1卷1期。

94 药堂（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

只是希望中国民族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一致联络。”⁹⁵

周作人所提倡的儒家文化的思想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它与五四新文化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实际上，他所重构的儒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一脉相承。敌伪主流意识形态把五四新文化视为英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恶果，是中国文化走向堕落的表现，并妄图铲除，而周作人则利用传统话语形式的掩护，让新文化的精神实质潜伏下来。其文化政治斗争的策略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周作人在四篇谈论中国思想的文章里，提出从语言和思想两个方面建设“汉文学”，这种文化思路来自五四文学革命。他把人本主义思想置换为儒家思想，其实经他重构过的“儒家人文主义”（Humanism）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是一致的。⁹⁶连五四时期“为人生”的主张也是可以拿来用的。言辞的变化是要在表面上合乎敌伪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民族固有的语言和思想。其间的联系可以从《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的文本形成过程中看得清楚。这篇文章是周作人在演讲词的基础上改做而成的。1943年4月13日，他在南京的伪中央大学讲演，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其中说：“我平时以为中国政治道德和文学上有两大思想，互为消长，在廿年前的《新青年》杂志上，曾发表一篇《人的文学》，这当然是少年气盛，胡说八道，但在现在看来，里面所说的话，加了廿余年历史事实的证明，觉得还有适应的地方”⁹⁷。这段话在改作中被删去了。从中很容易看出它与周氏“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⁹⁸的。

周作人在1949年致周恩来的信中讲得更清楚：“他（指李贽——引者）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在《焚书》中有一篇信札，说明自己不相信古人，而偏多引他们的话，这便因为世人都相信典故，借了古人

95 作人：《国语与汉字——至胡适之》，1936年6月28日《独立评论》第207号。

96 参阅黄开发：《周作人的精神肖像》，30-37页。

97 芮琴和、张月娥、黄圭彬、陈继生记：《人的文学之根源——四月十二日周作人先生讲演》，1943年5月3日《中大周刊》97期。

98 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5卷6号。

的话过来，好替自己作屏风罢了。我也并不相信孔孟会得有民主思想的，更不喜欢汉宋以来的儒教徒，可是写文章时也常引用孔孟的话，说孔孟以前的儒家原是有可取的，他们不信奉文武周公而以禹稷为祖师，或者上去更是本于神农之言也说不定，他们的目的是要人民得生活，虽然不是民治，也总讲得到民享，这里也是用的同一方法，即所谓托古改制，自己知道说的不是真实，但在那环境中也至少是不得已的。民国三十二年中所写，论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这些篇，都是这一例。”⁹⁹这段话道破了天机。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还特别强调了当时环境的制约。

四

周作人出任伪职时期的思想和行为是需要在其“必败论”的思想语境中认识的。在他的心目中，抗战的结果是必败的，即便不是失败，其进程也肯定是漫长且荆棘载途的。他考虑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在国土沦陷、大难临头的情势下，尽力保存民族国家的实力，并有利于自我生存。他所做最大的两件事情是出任伪教育官员和提倡儒家思想，二者是互相联系的。下面再来谈谈这两件事所发生的影响及其对这它们的评价问题。

关于写作《中国的思想问题》的用意，有过各种不同的解读。《中国的思想问题》触怒了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片冈铁兵，周作人说：“我当初的用意只是反对新民会的主张，却没有料到这样大的收获，至于敌人封我‘反动老作家’或‘残余敌人’，则更是十二分的光荣了。”¹⁰⁰片冈铁兵给周作人复信道：“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假如中国人虽赞成大东亚解放，而不愿生存上之欲望被阻害，即中国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思想成为一般的意思，则在此战争上中国之立场将何如乎。”¹⁰¹周氏把敌人的反对当作为自己的附逆辩护证据，其理由

99 周作人：《周作人的一封信》，《新文学史料》1987年2期。

10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731页。

是不充分的。钱谦益曾遭到乾隆皇帝的诋毁，但这并不足以钱氏失节开脱。《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认定，“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判（应为“叛”——引者）国之罪责。”¹⁰² 在研究者中，有的说是讲给“日本军政府中那些有远虑的‘明智派’听的”的“治安策”¹⁰³，有的说是“预备给后世子孙看”，预备替自己洗白的¹⁰⁴。我以为，虽说此文因为受到特定情势下历史语境的压力，写得世故圆通，照顾了多方面预期读者的观感，但主要是出于参加当下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写给日伪方面的人员看的。所以，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发表后，拨草寻蛇式地把文章寄给经松枝茂夫¹⁰⁵，由他翻译后在日本著名的《改造》杂志1943年4月号上发表，从而引起了日方人员的关注。攻击作者为“反动老作家”的片冈铁兵最早即由译作嗅出了抵抗的气味¹⁰⁶。

《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在当时的沦陷区广泛传播，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周作人在教育总署主办的讲习班上发表演讲，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宣传他的思想。演讲词题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可以说是其《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的普及版。¹⁰⁷ 这篇演讲词还被1941年11月《国民杂志》第十一期转载，《更生》1942年1月第十三卷第七期、第八期连续转载。《中国的思想问题》是在另一篇演讲词的基础上改作而成的。1942年5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演讲，演讲词《中国的思想问题——

10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734页。

102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7年12月19日），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1439、1440页。

103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465页。

104 袁一丹：《制造“敌人之敌”——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的反面文章及预设读者》，《文艺争鸣》2015年3期。

105 1943年3月2日松枝茂夫致周作人信，见赵京华译《松枝茂夫致周作人函（1936—196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11期。

106 《知堂回想录》，733页。

107 周作人：《中国的国民思想——在第三届中等学校教员暑期讲习班精神讲话》（速记记录），1941年9月《教育时报》2期。

周作人先生讲》载 1942 年 5 月 25 日《中大周刊》第六十五期，1942 年 6 月《江苏教育》第四卷第三期转载。改作而成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载于 1943 年 1 月《中和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43 年 2 月《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二）转载，1943 年 3 月《中国学生》第一卷第五期转载，1943 年 3 月《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三号摘录。1943 年 4 月 13 日，周作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发表题为《人的文学之根源》的演讲，记录稿刊于 1943 年《中大周刊》第九十七期和同年 6 月《真知学报》第三卷第二期。《汉文学的前途》同时于 1943 年 9 月 1 日刊登于《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和《中华月报》第六卷第三期。

在华北沦陷区，有人在周作人文章的影响下，同样提出中国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关于儒家思想，作者引用周作人的观点，说中国人的思想本来很健全的儒家思想，具体的就是“己饥己溺”、讲实际和中庸，换言之就是利人，这是“仁”的体现，可以用“仁”来代表儒家思想。若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忠恕”。然后，他把这个“中心思想”与汪伪政权的意识形态加以关联，说这种思想的发扬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主张东亚各民族的团结与联合，实在就是‘仁’字的表现。”又进一步指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简单说来仍是继续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加以发扬的，它的主要意义，也就是和前期的新文化运动稍稍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对于中国旧文化传统的再认识，一个是对于西洋文化的再吸取。”¹⁰⁸ 前面大谈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后又指出现阶段文化运动仍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发扬，这一矛盾构成对前文观点的消解。作者基本上是重述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前途》的观点，大概正是由于周氏政治和文化身份客观上形成的保护，作者才敢于发出不合乎日伪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吧。此文可视为周作人文章在敌伪内部产生影响的例证。

那么，周作人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发表这些文章的考量是什么呢？《汉文学的前途》引录顾炎武《日知录》针对钱谦益而发的议论：“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

108 金希民：《文化运动与中心思想》，1943 年 11 月 15 日《新民报半月刊》5 卷 22 期。

中而如噎，继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粟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¹⁰⁹以写《诗经》中《黍离》的亡国大夫、屈原、陶渊明为例，辨文情的真伪，发诛心之论。如果以“镜情伪”的态度来看周氏四篇论中国思想的文章，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可能不宜做黑白分明的判断。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中的有关对秦桧的评价、辩解与不辩解、对儒家文化的重构、道义之事功化、国语与汉字的政治功用等等问题的思想在战前已经出现，并且是前后连贯的、一致的。这几篇文章反映出周氏一向对日本将中国殖民化的野心的警惕，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患，而他所做的是力所能及的针对性很强的文化抵抗。几篇文章的标题醒目地冠之于“汉文学”“中国”等具有核心意义的民族主义的词语，把它们置于《药堂杂文》的前面，与《道德漫谈》《释子与儒生》等文一样反复引用“禹稷当平世”等儒家经典话语，力图将汉字、儒家思想牢牢地锁定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之所在。这里面可能不乏“自表暴而为言者”的“言伪”的表白成分，然而其用心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他在《汉文学的传统》中自称“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而后来一再以“道义之事功化”来打扮自己，拔高自己，恐怕就难脱“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的嫌疑了。周作人在《文坛之分化》一文中说抗战爆发后的北京，“只有几个流落在这里走不动的文人凑写稿件，聊以消遣，有如鱼相濡以沫耳。说是消极，固亦难免，却亦并不是只是十分颓唐，他们不以文学为职业，或是想于其中求得功业或是利权，但如或对于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在文学范围内尽其国民之力，也是愿意的。”¹¹⁰这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态度，倒反而让人感觉更符合实际。

周作人的上述文章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清初的几个遗民

109 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

110 周作人：《文坛之分化》，《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601页。

思想家。他们在现实无望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上的抵抗。由于日伪统治尚存很大的不稳定性，周也希望能够发挥一定的现实作用。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人处非常之变，志存匡复，所以张扬儒家的经世精神，从不同的角度批评宋明理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重建学术，以图恢复汉官威仪。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入明史馆，参与清廷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在与人的书信中，他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学术志愿：“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吾非敢自谓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与语此，故不惮冒天下之讥而为是言，愿暂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¹¹¹他以经世之心治史，寄希望于来者。当然，清初诸子与周作人不同。他们是在亡国的条件下，不与满清政府合作，始终保持了高风亮节，以超拔的毅力从事著述。

《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关注的焦点是民生。他一再引用《孟子·离娄下》中“禹稷当平世”一段，由禹稷的“己饥己溺”而推己及人引出仁政问题。民生又与周作人所出任的伪教育官员的职责密切相关，因为教育属于民生的基础工程，关乎沦陷区民众特别是千百万青年学子的切身利益，关乎民族国家的未来。正因为如此，当在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去世后，很多人属意于周作人。如何全面而公正地评价周作人在伪教育官员任上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通常是一笔抹杀的，然而不免过于简单化。

从“五四”到沦陷时期，周作人的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对社会动乱的忧惧，这也是他关注沦陷区民生的一层心理动因。《苦茶庵打油诗》有一首作于1942年10月的诗，云：“野老生涯是种园，闲衔烟管立黄昏，豆花未落瓜生蔓，怅望山南大水云。”诗后自注：“夏中南方赤云弥漫，主有水患，称曰大水云。”《苦茶庵打油诗》篇末的附记涉及到发表于1919年的新诗《小河》，说明他要表达的意思

111 万斯同：《与从子贞一书》，《万斯同全集》（8），宁波：宁波出版社2013年11月，265-266页。

是“忧生悯乱”的“忧与惧”，并说他的忧虑是一种“将来的忧虑”。¹¹²周作人在《关于老作家》一文中说：“我不会创作，不是文士，但时常写文章，也颇想写为文章而写的文章，而其结果还多是为意义而写的，不讨人欢喜的忧生悯乱的文字。”¹¹³

长期以来，对沦陷区民众生存状况的研究很不够，极少能在沦陷区研究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沦陷区生活过的人，在抗战胜利后是处于道德低地上的。

1945年11月17日，《华北日报》报道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到北平视察，在北平市中小学校校长教职员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其中说：“今日证明华北奴化教育整个失败，其功当归诸于各位教职员先生的身上。”¹¹⁴1946年6月3日，《大公报》又报道蒋介石在北平发表训话，报道称：“对于政治上之垃圾，谓凡属附逆有据者国家定予严惩。蒋主席认为无伪学生，亦无伪教员，有作恶行为者同样惩治。”¹¹⁵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负责教育复员工作。他坚持把所有伪北大时期的教员驱逐出北大，认为那些生活在沦陷区的师生应该接受再教育。王汎森指出：“民族主义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都被停职，很难找到足够的教师来填补这些空缺。按照傅斯年的标准，应该被再教育的学生数量也太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斗争之时，得到学生的支持是重要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已经太多，继续坚持推行忠诚或全民廉正活动显得不切实际。因此，支持傅斯年的人越来越少，他变得相当孤立。”¹¹⁶

非忠即奸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有利于抚平战争的创伤和社会发展。正因如此，才有了“教员不伪”“学生不伪”的政策认定。然而这个认定存在着逻辑上

112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1944年10月《杂志》14卷1期。

113 周作人：《关于老作家》，《周作人散文全集》（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156页。

114 《朱教长勉励各教职员 努力发展国民教育》，1945年11月17日《华北日报》第2版。

115 《蒋主席昨在北平训示 统一事权积极求功》，1946年6月3日《大公报》（天津）第2版。

116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205页。

的问题：“华北奴化教育整个失败”“教员不伪”“学生不伪”等是如何做到的？单靠普通的教员和学生是很难奏效的，这是否意味着有重要的伪教育官员发挥了作用？几个在北平沦陷时期与北平高校有过直接关系的人士提供过材料，或许能解开一些个中的奥秘。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志智嘉九郎回忆道：“中国的伪政府虽然是傀儡的，但大学并非傀儡。”¹¹⁷ 这虽然可能与日方对于大学某种程度上的不干涉有关，但也离不开周作人这样的主管官员有意识地抵制。时任伪北大文学院日文系教师的洪炎秋说，“他们（周作人、钱稻孙等——引者）当了伪要人，除曾拉我去教书以外，从不诱引我去做伪官，更不叫我去替日本人做任何事情”¹¹⁸。

在周作人受审时，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教授徐祖正、杨丙辰等五十四人集体向法院具呈，从教育和反思想统制两方面证明周作人在伪政府任职期间进行“消极抵抗”。在教育方面，“周氏在伪华北教育总署任内，为防止敌人驱使学生作政治上之工具、奴化训练之目标，首先命令凡在学学生均应以学业为重，不得参加政治活动。”周氏在任内时，“对各系课程之编制，悉按旧北大课程为标准，有伪《文学院一览》为证。不独各系基本科目均本旧章，即普通必修科目如英文一科，在他院校不敢排者，文院非但照排，且与日文同等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为加强侵略政策，请求增加日文授课时，但在周作人和其他中国教授的反对下没有得逞。在反思想统制方面，“日寇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中国思想之统制更形积极，因此四出捕人，摧残士类，无所不用其极，几至人人自危。周氏乃于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中国之思想问题》一文……此文为他人所不敢言，当时并遍登平津报章杂志，国人共睹，此为周氏以文字抗日最显著之事实。”徐祖正等评论道：“八年以来，华北教育幸得汤、周诸氏出而主持，未亡国本，事事与日寇虚与委蛇，苦心应付，所以八年之中，无数大学青年未致失学，否则，此万千学生，终必为伪新民学院等敌伪侵略性、政治性学校所吸取，其危害华北

117 [日]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117页。

118 洪炎秋：《未读其书先知其人》，1966年9月《传记文学》9卷3期。

人民，更不堪设想矣。尤以周氏本一文人，未尝登录仕版，此次出任委[伪]职，非出本愿，故即以消极态度，作有效之抵抗。”¹¹⁹这五十四人栖身于周作人任伪职的教育界，他们的证言是近距离从周氏的言行中观察所得。他们的说法也许不乏过甚其辞之处，但应该是有根据的。

还有几篇材料显得很另类，也是为周作人附逆辩解的，分别出自敌伪时期居留北平的周氏的朋友和学生俞平伯、邓云乡之手。

俞平伯于1945年12月28日致胡适信，为周作人陈情，希望胡适能利用自己的声望为周氏说话，使其受到公平的待遇。先是为周氏未能南下深感遗憾，并自责没有尽到切直谏言的责任，写道：“当芦沟启衅未久，先生曾有一新诗致之，嘱其远引，语重心长，对症下药，如其惠纳嘉谏，见机而作，茗盞未寒，翩然南去，则无今日之患也。此诗平曾在伊寓中见及，钦迟无极，又自愧疚也。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人之不相及亦远矣。”他为周作人辩解：“若今所言大学实情，乃其最显然者也。当日知堂不出，覬覦文教班首者，以平所闻，即有二三人，皆奸伪也。设令此等小人遂其企图，则北平大学之情形当必有异于今，惜史事不能重演耳。”进而抱不平：“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¹²⁰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收入关于周作人的文章两篇《知堂老人旧事》《知堂老人座上》。作者是周作人在伪北京大学后期的学生，1949年以后与周有过较多的交往。《知堂老人旧事》从一个曾经在伪校读书的学生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周作人附逆问题的看法。他说，周作人在敌伪时期所作，“虽不利于自己，却对沦陷后文化古城中不能远赴后方求学的穷学生们则稍有裨益……老人自然自己也知道出任伪职，甚至在伪北京大学中办学、教书，是什么性质，其时其际，既非

119 《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下），1389、1393-1094、1396页。

120 《俞平伯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868页。

为任何权势利益，也非考虑明哲保身、洁身自好等等了。”¹²¹ 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说：“我一到南京，记者纷纷来，多数问我北大复元首都高等法院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们，一是法院来问，不是北大去信；二、北大只说事实；三、此事与周作人无利与不利之说，因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顾北大产业……报载北大公事上说校产有增无减，此与事实不尽合。若以战前北大范围论，虽建一灰楼，而放弃三院（三院是我们收复的），虽加入李木斋书，而理学院仪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华焯兄言），艺风堂片又损失也。”¹²² 对此，邓云乡在《知堂老人座上》中反驳道：“信中话似乎严正，却殊欠实事求是，因‘照料北大产业’，不是照料私人房地产或商号古玩，这是举世闻名的政治运动中心策源地北京大学，在日寇统治之下，要照料其产业，而又不与日伪周旋，不担汉奸恶名，可能吗？更不用说还有一大群苦哈哈的穷学生了。但历史是无情的，文坛盛名和汉奸连在一起，这是永恒的悲哀了。”文章后面评论道：“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三者有时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时代里，更是难以周全。以上在第三点上，我以一个沦陷区的伪学生，虽然痛恨日寇汉奸，但对于老人，不能说这说那。在第二点学问上，更是没有说长道短的水平。在第一点为人上，则深感老人是那样纯朴淡泊，又和蔼诚恳，对家人、对学生、对朋友、对不熟悉的人，无一不以和善态度平易近人地对待。”¹²³ 作者为了替周作人陈情，自称“伪学生”。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和蒋介石都曾明认华北教育未曾奴化，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伪学生”之说。而邓自称“伪学生”，等于是自愿陪老师一起在道德的审判台前跪下了，令人动容。这下跪不是认罪，而是一种悲情式的抗议。可谓用心良苦。此文是在为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1996）一书而写的《忆知堂老人》的基础上经过较大修改而成，作者经历了一个欲言又止到把话说出来的思想过程。虽然俞平伯、邓云乡的立场和观点可能并不为多数人所同意，但代

121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147页。

122 《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912页。

123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147-148页，153页。

表了一部分亲历过北平沦陷后生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声音，可以丰富对周作人附逆问题的理解，值得重视。

周作人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认识使他误入歧途，陷入人生的困境，给本民族造成很大的危害。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审判在所难免。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周作人也并未替自己做无罪辩护。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危害已有大量的研究，不必赘述。有一则来自抗日战争初期对立方的材料，或可印证周作人附逆行为的危害，不妨一说。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¹²⁴日军占领华北以后，一直在物色各个领域中的头面人物，组成傀儡政权。毫无疑问，在文化教育领域，周作人是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的。即使有些消极怠工，对方也是愿意把他供起来，因为可以打击中方的抗战意识。不过，周作人并没有完全丧失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周作人于1937年7月说：“昔读威斯忒玛克著《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达》，得知道德随时地而变，曾大喜悦”¹²⁵。可是，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里，民族大义仍然是具有稳定性的。也许只有中国真正被日本征服，他的附逆行为才可能被宽恕，甚至得到某种正面评价。同时也应看到，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道德洁癖同样有害，因为那样容易忽视周作人的复杂性，抹杀他在多方面的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不利于总结其附逆的历史教训。他的和平观念带有历史的污点，然而在沦陷时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不乏思想史的价值。

124 《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1938年7月12日五相会议决定），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89页。

125 知堂：《关于自己》，1937年12月31日《宇宙风》55期。